

1860—1937年广州城市空间格局与形态演变分析*

Spatial Pattern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Guangzhou City from 1860 to 1937

吴隽宇 谢薇
WU Juan-yu, XIE Wei

摘要：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此时期广州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共同促进了其向现代城市的转型。通过对1860—193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全面抗战前夕）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事件、历史文献等进行梳理，探讨广州城市格局与形态的演变过程及特征，并从城市组团、道路系统、中心轴线、公共绿地4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最终得出这一时期广州市城市形态发展变迁规律：在保留了原有城市核心及山水结构的基础上，广州城在拆城墙后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形成了兼具统领性、开放性、高效性的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奠定了此后的城市形态与发展格局。

关键词：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空间格局；形态演变；广州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 (2023) 03-0031-05

收稿日期：2022-06-02

修回日期：2022-09-22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history, during which the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jointly promote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odern city. By sorting out 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Guangzhou's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from 1860 to 1937 (from the Second Opium War to the ev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zhou's urban pattern and morphology were discussed, and an in-depth explanation was made from four aspects of urban clusters, road system, central axis, and public green space. Finally, the law of urban morpholog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Guangzhou during this period was obtained: on the basis of retaining the original urban core and landscape structure, the city gradually developed towards the east and south after the demolition of ramparts, forming a modern urban spatial pattern with dominance, openness, and efficienc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urban morphology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spatial pattern;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Guangzhou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剧烈的变革，制度的更新迭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导致了城市空间发生重大改变。广州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策源地，最早接受晚清社会激变和中西文化碰撞的洗礼，成为城市发展变革的先行者，其城市尺度与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转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代表。

城市形态学萌芽于19世纪初，从地理学、建筑学与人文社会学等学科开始，将城市与形态学相结合，把城市看作有机体来观察和研究^[1]。近年来对于城市形态的研究流派主要为康泽恩学派以及卡尼吉亚学派，两者的特性均为对不同时期历史地图与规划进行分析，概念性地描述城市的形态。这也是近年国内城市形态研究多采用的方法^[2]。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功能组织方式的物质空间表征，其形成、发展与演变体现了城市物质形式对社会背景和城市功能的不断适应。由于城市功能活动依托于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新功能的产生往往带来城市的变化。

通过深入分析各组成要素，可以更好地了解城市形态变化的特征与肌理，促进城市不断发展。

对于广州城市空间格局与形态的研究，学界已有一定基础，但多为对较长时期内城市形态的总述^[3-4]。针对晚清至民国这一时间段，姚燕华^[5]结合广州工业化进程，对近代广州城市形态特征及其演化机制进行了研究；邹东^[6]以法规入手，对民国广州的城市规划与空间营造进行了解读。总体来说，城市空间与城市形态的内涵要素丰富，研究城市形态演变的工作量非常大，因而在研究时较难兼顾统筹与深化。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直至全面抗战前夕，广州在中西方经济、政治关系改变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其城市空间形态的改变为此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1860—1937年广州城市建设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文件以及重点实践进行梳理，选取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演化中有代表性的4个方面，深入分析其规划、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东西方建筑文化交互影响研究”(编号：21VJXT011)

实践的历程及其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结合相关文献与历史地图的分析研究,将此4个方面的城市建设实践进行空间落位与图示化表达。通过从庞大的城市形态演变系统中提取具体的城市建设实践,予以图示化的梳理,探寻广州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城市形态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响应与适应,以期为广州城市规划历史与城市形态学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1 西方现代规划思想传入

1919年,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将广州建设为南方大港与现代化国际都市,并以“花园城市”为指引进行整体构想。后孙科任广州首任市长,领导了广州在转型过程中的众多实践。其《都市规划论》梳理了西方规划发展历史,重点介绍了德、英、美三国的现代规划理论。孙科通过对西方规划思想与制度的研究,将理念与实践相结合,与众多归国精英共同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 近代广州城市变革的发展背景

凭借着鸦片战争前一口通商的优势,广州始终保持着与世界的联络。一口通商带来了社会的繁荣,也使广州的开放程度远胜京畿。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已通过引进西方的电报、电话等通讯设施发展城市公共事业,城市转型已然开始。辛亥革命后,汽车、电车等交通工具开始大量引入。为适应现代设施的新功能,1918年市政公所成立,以拆墙修路的西方经验对广州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同时以交通设施的建设带动城市改造的其他方面,如辟马路、装电

灯,带动了新式大号电灯在广州的应用^①。1921年,广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制市,成立了市政厅,其下设的工务局主要统筹城市建设工作。城市建设开始从引进西方设施、技术与实行拆墙修路的局部城市改造,转变为城市的总体设计与谋划。此后,广州的规划管理机构日趋成熟,城市建设逐步规范。1930年《广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颁布,明确了市区范围与城市功能分区。1932年广州第一部正式的规划方案《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颁布,对城市进行了全面、综合、系统性地规划^[7]。

此后规划内容逐步实施,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广州近代城市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图1)。

3 近代广州空间形态演变过程

近代广州城市建设活动十分活跃,促进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研究选取城市组团、道路系统、中心轴线、公共绿地等此时期广州城市建设中具有代表性的4个方面,探析城市规划与城市功能变化在实体空间要素上的反映,对转型过程中广州城市形态的演变特征进行归纳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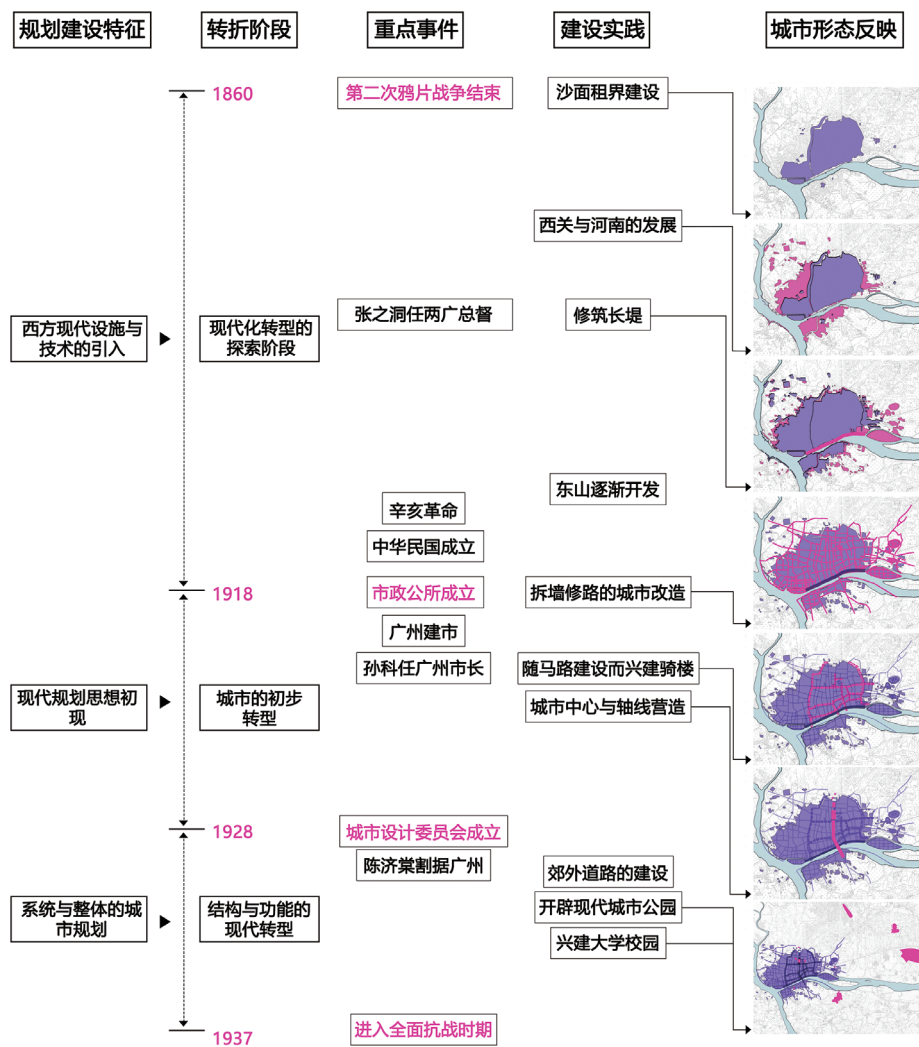


图1 1860—1937年广州城市发展阶段与特征

^① 广州市政府《市政府增设马路电灯之规划》,广州市政公报1928第306期

3.1 城市功能组团的发展

晚清时期，广州城内外有城墙阻隔，城外分为东关、西关、南关，北部为观音山（今越秀山）。西关作为广州商人的大本营，因明朝对外贸易的开展，成为城外最先发展的地区。早在1686年建立的十三行，已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第一要地。随着人口增长与商业发展的需求，城外各关逐渐形成聚集区，城市空间得到延伸（图2）。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国相中十三行旧址旁沙面“进可攻、退可逃的有利地形”，在此兴建租界。沙面采用西方规划手法，以方格路网划分区域，并于其中预留公共设施用地。此后，新的城市风貌逐渐出现，沙面也成为继十三行后广州具有显著西方城市特征的现代街区。

位于广州东侧的东山在晚清时仅是一片地势稍高的荒凉山岗，鸦片战争后，在华的西方传教士通过这片东郊之地深入广州城。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众多华侨与本地富商纷纷在东山一带择地而居，以致“地价日增，屋宇日盛”。1915年广九铁路以南的大沙头规划为居住区，并于同年启动建设。在“花园城市”理念影响下，东山模范小区等系列现代住区也开始推动建设，东山一时成为大批政要、华侨与留学生的聚居地^[8]。西方教会、高官显宦、当地华侨等群体对东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东山最终成为与西关齐驱并进的城市组团。

在西关与东山蓬勃发展的同时，珠江南岸（俗称“河南”）也逐步形成集聚发展的工业组团。早在明中叶，河南沿江一带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传统手工业作坊。此后洋务运动兴起，众多富商、华侨纷纷在此设厂建房，周边聚居式村庄逐渐形成。1929年陈济棠主粤后，工业在城市的发展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西村、河南在《城市设计概要草案》中被规划为工业区，先后建立了50余家工厂。工业成为了河南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使河南迅速成为广州市南部重要的集中发展片区（图3）。

西关作为重要的商贸与居住组团，在晚清时期已成为近代广州与西方连接的重要枢纽。东山则因教会、侨民、富商及政府官僚的推动，成为综合性的居住、生活组团。河南也在政策推动下逐渐被开发，成为广州重要的工业发展组团。此时，广州古城外东、南、西三侧均已出现集中发展区，广州城市空间得到拓展。

3.2 现代马路与骑楼的兴建

1888年张之洞筹议于珠江北岸修筑长堤，旨在“弭水患而利民生”。为彰显繁华整洁的城市形象，张之洞首修天字码头至海珠桥段堤岸。长堤大马路于1914年竣工，长3.62 km、宽15.24 m，建成后商机蓬勃，交通便利，是广州首条自主建设的现代化马路^[9]。作为沿江主干道，长堤以水陆发达、交通便利等优势逐步取代西关，成为广州最为繁荣的商业娱乐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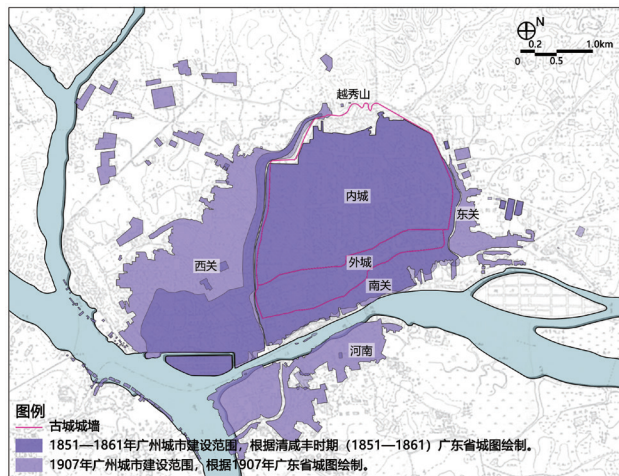


图2 晚清时期广州城市建成区域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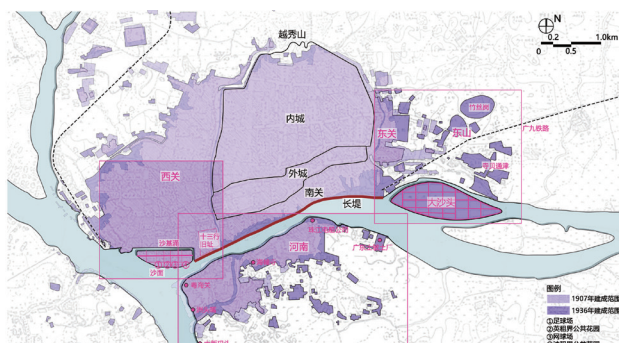


图3 西关、东山、河南各组团空间

长堤的建成使沿江一带得到发展，也加剧了内城的衰退。1918年孙科任市政公所督办，首要任务就是拆城墙、修马路，以此解决城市人口增长、用地缺乏等问题。随着永汉门拆除，长137 m的永汉路得以修建。此后城墙逐步推倒，城基改为马路，大小方格网加环线的棋盘式道路系统逐步形成，广州城市格局由此从封闭转为开放，从传统走向了现代^[5]。1929年，市行政会议将马路建设分为市内及郊外2个部分，以原城区为中心，通过马路将各聚集区域连接^[10]。城市空间因此有序扩张，呈现集中连片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市道路改造初期，广州已开始利用拆城筑路之便广修骑楼，提出“凡堤岸及各马路建造屋铺……留宽八（英）尺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11]。骑楼底层架空，在遮阳避雨的同时营造了宜人的商业氛围。在进行道路改造的时期，广州马路宽阔，骑楼林立。骑楼通过效仿西方道路与建筑形态，均衡各方需求，使城市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图4~5）。

在广州的转型过程中，长堤修筑突破性地打开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之路。此后的拆墙修路及骑楼兴建等改

造运动，伴随着市政设施与技术的更新，使广州的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但由于骑楼与商业紧密联系，这种以骑楼为载体的空间并不适用于郊区的发展。此时的广州以一系列城市改造运动，在旧城内实现了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3.3 城市中心与轴线的形成

1919年，孙科在其《都市规划论》中首次介绍了德国城市的中心观念与中轴线空间形态，他在此影响下推动了广州行政中枢及城市轴线的规划与建设。此后，广州国民政府筹备建设纪念孙中山的系列建筑。中山纪念堂为当时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综合考虑了与粤秀山上的纪念碑“精神上之联络”，使得“前堂后碑”的格局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呈现^[12]。后场地西扩与堂址西移，既确保了堂碑格局以及中山纪念堂、纪念碑、镇海楼的南北中线关系，又与南部的第一公园（又称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相关联。1930年，市府合署选址于第一公园后半部，从而形成了以“镇海楼-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中央公园”为序列的城市中心与轴线。1933年，海珠桥新建，此后珠江两岸得到连通，北起越秀，南跨珠江至河南的近代中轴线形成，统领了此时广州的城市空间（图6）。

3.4 城市公园与大学校园的产生

广州近代最早的公园出现在晚清时期的广州十三行。19世纪中叶，十三行英国花园和美国花园已具备了现代公园的特征，也是该时期全球范围内公园渐兴的体现^[13]。

1918年，孙中山提出广州拟建花园都市的理念。此后，孙科开始进行整理城市卫生、美化环境、开辟公园等举措，并认为在城市设计之初需预留用地，以开辟大小公园及游乐场作为绿化及活动场地。1918年建成的第一公园是广州第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园，开启了广州公园建设的热潮。《广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记载，至1930年全市已建成中央、海珠、越秀、东山4处公园，另计划开辟白云、河南、西关、永汉、东湖5处公园。其中白云公园位于当时北郊，可见当时公园已出现向郊区发展的趋势。

在公园发展的同时，大学校园在城市建设中也充当着重要角色。1904年，岭南大学开辟于河南康乐村（现中山大学海珠校区），依托开阔平坦的地形，形成了兼具实用与美化功能的校园公共开放空间。随办学建立的种植园、农场等校园生产性景观，形成了独特的校园公共绿地空间^[14]。1933年，国立中山大学选址于东郊石牌，校园不设围墙，与城市连接，呈现出中国传统礼制与现代开放式校园理念结合的空间特征。其校园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下结合地域环境特征建设而成的优秀作品，借鉴了西方规划理念，将校园空间融入了城市公共绿地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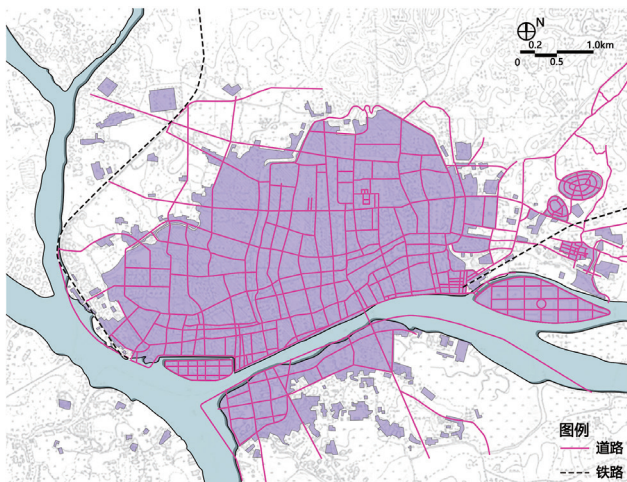


图4 马路建设



a: 广州市第一批规划建设的骑楼，根据广州市第一批新辟马路名称图绘制
b: 永汉路两侧的骑楼，与1920年的永汉路形成鲜明对比
c: 城基马路（太平路）两侧的骑楼，骑楼的建设改变了城市风貌

图5 骑楼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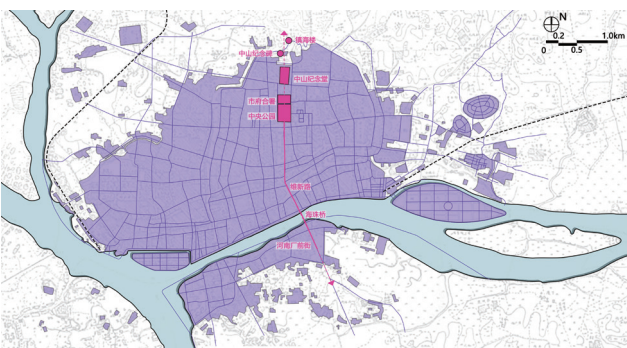


图6 广州近代中轴线空间关系

1918年第一公园的建立,使广州拥有了面向大众的现代公园。此后市内公园逐渐开辟,郊外公园与大学校园兴起,于全市范围内建立起公共绿地体系,推动了广州向现代化城市的转变(图7)。在广州城市转型过程中,城市中心的营造加强了市民对城市的精神认同,公共绿地空间建设则于大街小巷中体现了城市对于市民的关怀,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城市空间走向了现代化。广州城市的现代化转型从旧城区开展,通过市区与郊区系统的马路、公园规划,和大学校园建设等,实现了对整体城市空间更加全面与深层次的建设。

4 总结与讨论

总体来说,晚清至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空间与形态的演变可以分为前期缓慢发展、中期实质转变、后期逐渐停滞3个阶段。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50余年中,广州城市形态整体仍延续此前格局缓慢发展,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城市的现代化转变才初步完成。这一时期,城墙拆除、马路新建等为城市拓展奠定了基础,河南工业、东山住宅、远郊的公园与大学校园等作为这一时期城市重点建设项目,反映了城市空间的拓展方向,使城市空间格局与形态产生了质的变化,奠定了此后广州城市的形态与基本发展格局。

1860—1937年,广州迈出了城市空间往东、南方向拓展的步伐,并突破城墙限制,以马路兴建为城市的集中连片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以各种建设实践丰富了城市空间的构成要素,形成了兼具统领性、开放性、高效性的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因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广州的城市发展仍延续此时的总体思路,城市核心保持不变,同时保留原有山水空间结构,城市建设往东、南方向推进。由晚清至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

践可以看出,当代城市建设必须要结合城市发展的需求,在借鉴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基础上,考虑中国城市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以及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等,从而产生因地制宜的、考虑中国本土历史情境的城市建设思路。结合当代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快速与无序扩张的现象,晚清至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实践仍然能够带来启示,引导当代城市建设。

注:图5-b、5-c引自《广州指南》(广州市政府.广州:培英印务局,1934);其余图片为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 [1]段进,邱国潮.国外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J].城市规划学刊,2008(5):34-42.
- [2]田银生,谷凯,陶伟.城市形态研究与城市历史保护规划[J].城市规划,2010,34(4):21-26.
- [3]周霞.广州城市形态演进[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4]牟凤云,张增祥,谭文彬,等.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特征与时空演化分析[J].地球信息科学,2007(5):94-98.
- [5]姚燕华,陈清.近代广州城市形态特征及其演化机制[J].现代城市研究,2005(7):32-39.
- [6]邹东.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规划与空间营造解读[J].规划师,2012,28(4):122-125.
- [7]邹东.试论民国时期广州规划建设[J].规划师,2017,33(1):142-146.
- [8]叶农.美南浸信会与广州东山口——一个历史宗教地理学的典型范例[J].世界宗教研究,2012(2):10-21,194.
- [9]杨颖宇.近代广州长堤的兴建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J].广东史志,2002(4):12-17.
- [10]彭长歆.岭南建筑的近代化历程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4.
- [11]段云章,陈敏,倪俊明.陈炯明的一生[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01.
- [12]彭长歆.一个现代中国建筑的创建——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筑与城市空间意义[J].南方建筑,2010(6):52-59.
- [13]彭长歆.中国近代公园之始——广州十三行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J].中国园林,2014,30(5):108-114.
- [14]黄雯雯,林广思.岭南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特征及其动因分析[J].中国园林,2021,37(10):134-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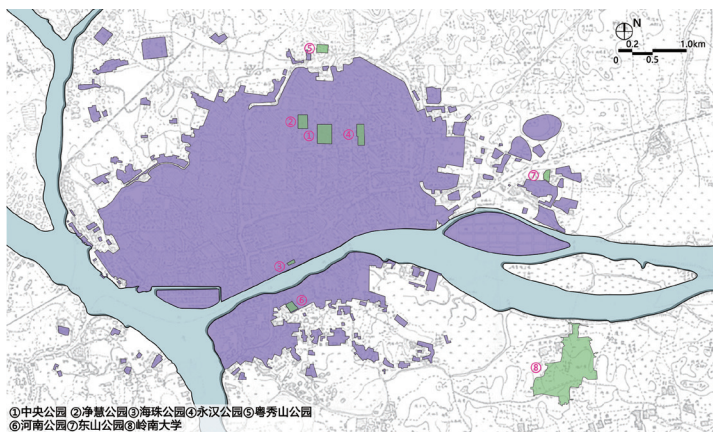


图7 民国时期广州公园与大学分布情况

作者简介:

吴隽宇/1975年生/女/广东广州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510640)/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遗产保护

谢薇/1998年生/女/湖南长沙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510640)/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学